

來新夏著

中國近代史述叢

齊魯書社



中国近代史述丛

来新夏 著

齐 鲁 书 社

一九八三年·济南

中国近代史述丛

来新夏 著

齐鲁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临沂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4.125印张 312千字

1983年9月第1版 1983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200

书号11206·71 定价1.85元

《中国近代史述丛》序

感谢齐鲁书社为我出版《中国近代史述丛》这本书，使我能借此回顾一下三十年来走过的学术道路，并保留下深浅不一的履痕萍踪。

我虽然是历史专业出身，但真正接触近代史则是一九四九年在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范文澜同志指导下才开始的。《太平天国底商业政策》正是我在近代史方面学步的一篇处女作。后来，我就逐步地进入了近代史的教学与研究领域，陆续写了包括现在收入《述丛》中的数十篇习作。

《中国近代史述丛》共收录了我从五十年代以来在近代史方面的习作二十三篇和一组读书笔记。这些习作正如书名所表示那样。它们并不是什么有创见的论文，而只是努力按照范文澜同志“板凳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的教诲，为了锻炼自己的研究能力和适应教学要求，力求把若干史事叙述清楚，为他人作一点铺路石子的工作。因此当我把这些习作汇为一集时，经过反复审读，最后还是认为题名《述丛》比其他题名能更确切地反映我近三十年来在中国近代史方面所作的工作。

《中国近代史述丛》所收的习作大致包括以下五个方面：

（一）为参加当时学术讨论而写的习作。从五十年代以来，中国近代史划阶段问题经胡绳同志提出后，立即在史学界

得到应有的反响，许多学者各抒己见，展开讨论。我在学习这些论文的基础上，先后写了两篇短文（集中总题为《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划阶段问题》），参加了讨论。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也是五十年代比较为人瞩目的讨论课题，当时报刊上陆续发表了不少有关论文，其中有一部分文章着重探讨了太平天国的基本纲领——《天朝田亩制度》的性质。我也从中得到某些启发而写了《〈天朝田亩制度〉是农民革命的纲领》一文，主要希望借此获得一些教益。

（二）为纪念重大历史事件而写的习作。一九四九年，为了纪念一九五〇年太平天国起义百周年，华北大学历史研究室（不久即改制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同志们在范老亲自主持与指导下写了一组文章，编印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论文集》（三联书店，一九五〇年出版）。我在近代史方面的第一篇习作《太平天国底商业政策》也被收录。一九五六年，为了纪念孙中山先生诞生九十周年而写了《略述孙中山“以俄为师”的政治主张》一文。一九六一年，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由我执笔写了《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天津的革命活动》一文。一九七〇年，为了纪念天津人民反洋教斗争的百周年，我曾满怀激情地写了《论天津教案》一文，但直到一九八〇年始获发表。

（三）为撰写专著作准备而写的习作。我在撰写专著前，往往喜欢在资料搜集大体齐备的基础上先写一篇纲要式的文章作为提示，或者先写片段试笔。如为写《林则徐年谱》一书而写《林则徐传论》，为写《古典目录学浅说》而写《清代目录学成就浅述》，为写《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而写《清人年谱的初步研究》，为写《北洋军阀史稿》而写《略论北洋军

阅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和《谈民国初年白朗领导的农民起义》，为写《方志学概论》而写《略论地方志的研究状况与趋势》等等。这些习作，有的被专著部分地采用，有的就作为专著的代序。

（四）为了丰富教学内容和试探性地填补个别空白点而写的习作。如有关鸦片战争的多篇习作、有关甲午战争的两篇习作以及《同盟会及其政纲》和《反清的秘密结社》等篇都是在这—动机之下动笔的。其中如《试论清光绪朝广西人民大起义》一文则是感于近代史教学中，在教学大纲上都标举了一九〇三至一九〇五年的广西起义，但一些著述中又大多语焉不详，所以我就搜集了有关资料，排比撰次而成此篇。

（五）一组读书笔记。长期的读书生活养成了一种“书山有路勤为径”的习惯，总感到记忆的不足恃，而喜欢写点札记，积久成册，题为《结网录》，但后来三册札记散失殆尽，仅剩已成篇发表的几则和少量残稿，现选录数则，改题《结网小录》，以志采铜之劳。

《中国近代史述丛》所收各篇是在不同时期完成的，为了保存原来的基本面貌，除了《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禁烟问题”》一篇因系发表后不久就作了较大的修改，仍能反映当时水平而收录改写稿外，其他各篇都只作了少量的增订或不加改动。各篇大略以内容所及史事时间先后为序，但篇末都记录了发表时间，以示进德修业的轨迹。从这次回顾检阅中也使我深感愧作。三十年的漫长岁月，自己在学术研究上，即就数量而言已是微不足道，遑论质量是否符合起码水平。尤其是，比量各篇几乎仍在原地踏步，没有什么显著的进展。这一点是深负师友们的殷切期望的。

《中国近代史述丛》编成之时，适值我六十初度之际。按照传统习惯，这应是一个新周期的开始。为了补偿过去三十年的荒弛，深愿在新周期开始时，从零起步，遑厉风发地加速前进。为此，我特请老友金石家傅耕野兄为我镌刻一方“花甲少年”的用章作为鞭策。我必须在今后十年中鼓其余勇，努力拚搏，至少作出与前此三十年等量的工作，庶在古稀之年能有《中国近代史述丛》续集呈现在广大读者面前求教。

《中国近代史述丛》在整理出版过程中承卞孝萱、焦静宜等同志的支持和协助，书法家王颂余教授的惠题书名，都在此表示深切的谢意。

我真挚地期待着新知旧雨和广大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来新夏

一九八二年秋夜写于南开大学北村遼谷

目 录

《中国近代史述丛》序·····	(1)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划阶段问题·····	(1)
略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年代·····	(1)
对中国近代史划阶段问题的几点看法·····	(7)
第一次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对外贸易政策·····	(16)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的“禁烟问题”·····	(36)
论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清朝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	(67)
林则徐传论·····	(82)
第一次鸦片战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 ·····	(101)
关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中外反动势力结合的问题 ·····	(137)
《天朝田亩制度》是农民革命的纲领 ·····	(145)
太平天国底商业政策 ·····	(154)
南昌教案 ·····	(169)
论“天津教案” ·····	(179)
中日马关订约之际的反割台运动 ·····	(192)
中日甲午战争后台湾人民抗日始末 ·····	(205)
试论清光绪末年的广西人民大起义 ·····	(221)
同盟会及其政纲 ·····	(255)
辛亥革命时期有关天津的革命活动 ·····	(270)
略论北洋军阀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	(278)

谈民国初年白朗领导的农民起义	(291)
略述孙中山先生“以俄为师”的政治主张	(307)
反清的秘密结社	(316)
清代目录学成就浅述	(326)
清人年谱的初步研究	(345)
略论地方志的研究状况与趋势	(371)
结网小录十一则	(390)
(一) 龚自珍林则徐往返函件的写作日期	(390)
(二) 略谈“禁烟运动”对英国的影响	(392)
(三) 鸦片战争前后银贵钱贱的情况和影响	(396)
(四) 自制望远镜的郑复光	(399)
(五) 中国近代化学家徐寿生平补正	(403)
(六) 曾国藩的媚外	(407)
(七) 日帝侵占台湾后的统治者——总督	(411)
(八) 《共和新三字经》	(416)
(九) 关于北洋军阀史的文献	(418)
(十) 北洋军阀的来历	(424)
(十一) 北洋军阀对内搜刮的几种方式	(432)

关于中国近代史的划阶段问题

略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年代^①

近年来许多讨论中国近代史“划阶段”问题的论文，对于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年代都认为是一八四〇年，其中有的同志虽然在论文中有似乎承认以一八三九年为开端年代的意思，然而没有明标出来^②。我从以下几个方面主张应以一八三九年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年代。

（一）从反侵略的意义上看

中国社会在将进入近代的前夕，虽然已届封建社会后期，但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基本上还是以自然经济占主要地位，不甚需要外来商品；而英国当时已是一个有相当发展的资本主义

①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七日，我曾发表《谈‘我们对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的笔记》一文，我把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年代定为一八三九年，当时因篇幅所限，没有具体说明。后来，有同志曾向我口头提出意见，认为这只是一年之差，关系不大。最近，史学月刊一九五七年第一期中，毛健予同志的《关于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的介绍》一文中，对我以一八三九年为第一段的开始，也提出了“理由未见说明”的意见。因此，我特草此文来说明我的主张。

②例如孙守任同志在论文中曾说：“一八三九——六〇年间连续发动的三次战争及其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推销和原料掠夺开放了整个中国”（《历史研究》一九五四年第六期七页）。他在叙述中国近代社会走向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整个过程时又说：“一八三九——六四年，资本主义国家侵略势力发动了三次侵略战争。”（同上八页）

国家，它需要向外扩展，首先是开辟市场和原料产地以倾销商品和掠取原料。但是它的对华贸易却总处在入超地位。因此，更需要有能改变这种局面的输出品。十八世纪中叶后，它找到了“鸦片”，于是便用各种非法手段，大量输出。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英国终于达到自己的侵略目的，使自己居于对华的出超地位了。

随着鸦片输入量的增加，中国的财政金融和国民经济生活遭到严重的破坏，加之毒品的残害身体和贿赂的腐蚀官僚机构，引起了整个社会反对那表现在“鸦片”形式上的外国侵略。广州人民在一八三八年底和一八三九年初曾两次进行反对鸦片和英国破坏中国禁烟的斗争，而后一次有八千到一万的群众参加了反对侵略的示威队伍^①。地主阶级中的官僚和知识分子如包世臣、朱樽、许球、袁玉麟、黄爵滋、林则徐等都讨论到这个问题，指出鸦片对中国社会的危害。清政府虽从雍正以来，即曾颁布过若干禁烟法令；但到这时，才把禁烟问题看成政治上的大事，在政府内部展开“弛禁”和“严禁”的争论；最后，更由于全社会的要求和政府本身感到“银荒兵弱”的威胁而决定采取“严禁”政策。道光十八至十九年间，它进行了各项禁烟活动；道光十九年（一八三九年）颁布的“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三十九条，本身固有很大缺点，但毕竟是集清朝前此百余年来禁烟法规的大成；同年，林则徐奉命到广州，正式展开了以反对外国利用鸦片进行侵略为主旨的“禁烟运动”与侵略者展开正面的斗争。侵略与反侵略的矛盾关系至此发展到了高潮。必须指出，“禁烟运动”决不能理解为单纯的反对

^① 亨德：广州番鬼录（《鸦片战争》资料丛刊Ⅰ页二六一——二六二）。

鸦片。因为一则英国“向中国进行鸦片走私是经过大不列颠的国会准许的”，鸦片贸易的本身，也是经英国的“最高当局准许的。”再则“鸦片……是大不列颠对印度与中国进行国际贸易的手段，用来换取中国的茶叶与蚕丝，并且使这贸易均衡，有利于英国。①”因而，“禁烟运动”实质上就是反对外国侵略的一种斗争，这也就是英国为什么要破坏中国“禁烟运动”的道理所在。由此可见，中国近代史应该是以一八三九年的“禁烟运动”作为开端的。

（二）从英国发动战争的事实来看

当中国一开始“禁烟运动”时，英国就坚持不放弃鸦片贸易的立场，进行各项挑衅活动。

在林则徐到广州积极推行“严禁”政策的具体步骤——缴烟、销烟、具结时，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便千方百计从中阻挠反对、制造纠纷，积极准备挑起侵略战争。一八三九年七月七日，他制造了“林维喜事件”，作破坏中国主权的挑衅性试探。同年八、九月间英国开来兵船“窝拉疑”号和“海阿新”号。这样，便增强了义律的侵略野心，积极图谋实现武装侵略。九月四日，义律竟然带领兵船等以索食为名，进攻我九龙口岸来挑动战争。十一月三日，英国所新派来的这两只兵船又在穿鼻洋向中国保护正当贸易的水师进攻，接着，从十一月四日到十一日，中英又在官涌一带接仗六次。这些次都是中国获胜②。这种进攻事实已是明显得无可讳解了。因此以一八三九

①英国蓝皮书《译文据《鸦片战争》资料丛刊Ⅰ页六四三、六四五）。

②《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八。又在马士的“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中也不能不承认穿鼻海战是“战争的爆发”。

年作为英国发动战争的正式开端，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恐怕更能切合历史的实际一些。至于有人说，英国是在一八四〇年才正式出兵；我则认为，一八四〇年英国大量派遣侵略军只不过是一八三九年军事进攻的继续和扩大。如果一定要从一八四〇年才作为侵略战争的开端，那么无形中替英国侵略者把自一八三九年即已开始发动的侵略战争的事实从历史上轻轻地抹掉了。

（三）从英国资产阶级和政府 决定侵华政策的时间看

侵略中国是英国资产阶级久已感到极大兴趣的事情，因此当义律破坏“禁烟运动”和进行武装挑衅等侵略活动时，他们都非常活跃，欢呼机会的来临，并且表示了积极支持这种侵略活动的态度。从一八三九年九月以后，英国各地资产阶级纷纷给政府上书，他们用种种理由来论证对中国应该采取的态度：曼彻斯特、伦敦、李滋、利物浦、卜赖克卜恩、布列斯特各地商人都要求英国政府对中国采取“迅速的、强有力的、明确的对策”。“希望政府采取有效方法”。伦敦商人在当地“东印度与中国协会”应巴麦尊请求而写的意见书中，全面而具体地反映了英国资产阶级主张对华侵略的凶狠面目。意见书用了很大的篇幅论证侵华的必要性，他们主张“应当用武力强迫中国方面让步”，他们提出一些对中国的要求，而认为“这些要求，只有表现充分的武力，才能有希望得到”。他们又提出与中国订约的七项具体内容，如开放口岸、废除洋行、协议关税、割让岛屿等，这些内容实际上在日后的“江宁条约”中都明文规定出来了。在附件中，这些资产阶级更“热心”地为政

府规划了一个军事装备和进军方略的草案。所有这些主张都是一八三九年九月至十一月间所发表，因此英国资产阶级的阶级态度是在一八三九年就完整而具体的表露出来了^①。

至于英国政府的决策时间，在丁名楠等同志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开端》一文中曾指出，一八三九年十月十八日，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曾以密函通知义律说，“英政府已决定派遣海军‘远征’中国，届时将封锁广州与白河，占据舟山，并拘捕中国的船只。”^②由此可见，英国政府早在一八三九年十月就已确定了对华侵略政策。至于到一八四〇年四月方在议会宣布和讨论，那正如上引之丁文中所指出的，是“充分表现了英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虚伪性”。有人认为应以英国通过决议案后发兵才算战争的正式开始，那么，恰恰是上了这种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虚伪性的大当，而忽视了对英国政府实际决策时间的考察。

（四）从清政府对外态度的变化来看

清政府自穿鼻、官涌等战役连获胜仗后，即于一八三九年十二月十三日下令停止中英贸易。道光皇帝的这个措置虽然含有对敌情缺乏正确认识和虚骄的成分，但清政府反对英国的基本态度和那时全社会反对侵略、反对鸦片的要求仍是一致的。从这时起，英国方面在积极准备扩大这次侵略战争，而清政府方面除林则徐等在闽粤一带有所准备外，其他各地则均未设防。这时，清政府依然抱着拒外的基本态度。一八四〇年六月

^①英国蓝皮书（译文据《鸦片战争》资料丛刊【六四四一六五七】）。

^②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集刊第1集。

间，英国侵略军进犯闽粤沿海不逞，乃又继续北攻浙江，七月六日攻陷定海，清政府立即表现了张皇失措的态度。八月十一日，英船至天津，清政府态度有了显著的变化，命令投降派直隶总督琦善负责交涉。琦善在其向清政府的各次报告中，一力主张投降。他认为反对英国侵略有种种困难，况且“本年即经击退，明岁仍可复来，边衅一开，兵结莫释”。他把英国的侵略解释为“意在乞恩求请各款”，即如侵占定海“亦缘先被轰击，始行回手”。并向英国侵略者保证对林则徐等“重治其罪”，只要求他们立即“返棹南还”，来解除皇帝的紧张^①。从此，清政府就开始改变过去“严禁”和拒外的态度而走上妥协和投降的道路。刘曾谿《和夷纪略》中曾说明这种变化道：“道光二十年七月（一八四〇年八月）命伊里布为钦差大臣赴浙江，且飭沿海督抚收洋人书驰奏，……诏以琦善为钦差大臣，赴广东，革林则徐邓廷桢职。^②……”清政府为使英船离津返粤时，免于在沿途遭到意外，而特谕沿海督抚：“如有该夷船只经过或停泊外洋，不必开放枪炮，但以守御为重，勿以攻击为先。^③”清政府对外态度的变化，我认为也是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

如上所述，我认为把中国近代史的开端年代定为一八三九年，似乎较确切一些。当然，我所陈述的只是个人一点不成熟的粗浅意见，提出来向同志们请教。

（原载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二日《天津日报》学术专刊）

①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十二、十四、十五。

② 《鸦片战争》资料丛刊Ⅵ页二五二。

③ 《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十四。

对中国近代史划阶段问题的几点看法^①

“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是当前史学界业已展开讨论的一个问题^②。从一九五四年初起，有胡绳、孙守任、范文澜、金冲及、戴逸、荣孟源和李新等同志陆续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提出了各种不同的分期主张，有七期、五期、四期、三期等意见。天津师范学院历史系中国近代现代史教研组同志们所写的《我们对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初步意见》（以下简称《初步意见》）一文是最近发表的一篇，主张分为三期。我由于业务关系，曾经学习了这些论文，也随手写了点笔记。这里只把有关《初步意见》的一点笔记摘录出来就教。

一、关于划阶段的“标准”问题

过去所有的论文对于这个问题，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种不同的意见。

（一）“按照中国近代史的具体特征，我们可以在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而“以三次革命运动高涨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准”。

（二）“以中国近代社会的主要矛盾的发展及其质的某些

① 本文原是《谈〈我们对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初步意见〉》一文的笔记。

② 过去所有论文都把这个讨论称作是“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我认为“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是在连续性历史时期中划分阶段的问题，不能象古代史那样称为分期问题，而应称作“划阶段问题”。苏联《历史问题》杂志编辑部在《关于苏维埃社会史的分期》一文中说：“应当确定‘时期’（Период）、‘阶段’（Этап）、‘时代’（Эпоха）等名词的含义，在所讨论的论文中对这些名词的使用，显然是有缺点的。”（《史学译丛》一九五六年第一期）因此，我认为用“划阶段”来代替“分期”一词是较为确切的。

变化为标准。”

（三）“以社会经济的表征与阶级斗争的表征相结合作为分期标准。以阶级斗争的重大事件作为分期的界标。”

第一种意见是胡绳同志首先提出来的。过去有许多同志赞同这个主张，《初步意见》也表示“同意胡绳同志提出的以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作为划分时期的标准”，并提出了理由。同时，也有一些同志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但是，无论赞同与否，我感到有些论文中只是截取了胡绳同志一句概括性的话，而忽略了他的其他更多的叙述。胡绳同志在论文中的“中国近代史中划分时期的标准”一段里，对于中国近代社会的特征做了比较全面的论述，最后才提出要在“基本上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着重点是我加的，下同）。胡绳同志着眼于阶级斗争的松弛或紧张方面，从而，他便正面的提出了以三次革命运动高涨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准”。胡绳同志所提出的“用阶级斗争的表现来做划分时期的标志”的基本论点是完全正确而可以被赞同的。只是因为他强调了阶级斗争表现的一个方面，所以就引起了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

第二种意见是孙守任同志提出来的。这个意见有它一定的理由。因为中国近代社会与过去不同，它有着两个主要矛盾，所以主要矛盾的发展和质的变化是需要考虑的。然而，若从主要矛盾应该是阶级斗争的角度来理解，那末，这个意见与胡绳同志的基本论点似乎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分歧，而只是补充了阶级斗争表现的另一个方面。

第三种意见是金冲及同志提出来的。这个意见把“标准”和“界标”两个概念区分开，是有助于讨论的。但是，提出两种“标准”却表现了对于阶级斗争的内涵意义的了解似乎还有所